

加快建立中国石油安全体系

张莱楠

8年前的3月20日，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八年后的同一天历史在重演，多国干预利比亚局势，又在为“石油而战”。石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次能源，约占全球能源消费的40%。为应对潜在石油危机，为保证中国石油安全，我们必须将石油安全置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尽快建立全方位国家石油安全保障的战略体系迫在眉睫。

中东北非地区占全球石油储量的57%和全球石油出口量的70%，未来随着危机扩散，极大增加了爆发第四次石油危机的可能性，不排除油价短期超过2008年所达到的峰值创出历史新高可能。从资源的稀缺性上讲，在可预见的十到二十年间还找不到石油的替代品，而人类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这种矛盾将导致原油价格节节攀升，一个由人类高度依赖石油资源所带来的危机正在加速到来，中国的石油安全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需求看，中国石油需求增速领先于其他新兴市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对石油需求大幅增加。2000年至2009年间，中国原油消耗占全球消耗的比例从6.3%升至10.3%，原油消耗增量占全球增量的50.4%，进口增量占全球增量的56.4%。2010年全年石油消费量达到4.55亿吨，较上年增长11.4%，需求依然强劲。

从石油进口依存度上看，从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进口国以来，其对外依存度逐步提高，到2006年突破45%，其后每年均以2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向上攀升，2009年中国原油产量1.89亿吨，净进口原油1.99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约为51.3%，2010年对外依存度更是超过了55%。而且作为一个经济规模还在增强的新兴大国，对石油的需求还将不断上升。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的预测，至2020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

从石油溢价看，目前我国每年有1万亿元用在石油进口上，测算表明，油价上涨10%，将会带来1000多亿元

的庞大开支。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对于石油需求量大、依赖程度深、进口依存度高的国家，一旦石油危机发生，挑战十分严峻，它不仅会导致严重的输入性通胀，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必须尽快制定保障石油安全的国家战略，把石油风险管理提上国家战略议程。

首先是保障石油供给。“手中有油，心中不慌”，建立和完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是应对国际石油市场突发事件的重要途径。欧美国家，包括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一般都保持有3-4个月的战略石油储备。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在浙江、山东、辽宁建立了4个石油储备基地，但即使这首批四大石油储备基地全部启用，再加上石油系统内部21天进口量的商用石油储备能力，也仅能形成30余天的战略石油储备。要想建立起3-4个月的缓冲能力，加快我国大型石油储备库建设已刻不容缓。

要改变对单一能源的依赖，积极发展可替代能源，有序发展煤炭，稳步发展石油，加快发展天然气，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渠道提高国内能源的供应能力，减少对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

加快海洋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我国海洋资源极为丰富，2005年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吨，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占总量的22.9%；天然气资源量为54.54万亿立方米，其中海洋为15.79万亿立方米，占29.0%。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08年我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的126倍和184倍。可探讨成立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基金，从目前市场规模测算，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基金大约需要1000亿人民币左右，来源可以是财政性拨款；或外汇储备的利息收益；或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部分资金；或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红利收入。国家基金应主要作为种子基金投入新建油气田的海洋油气开采。

尽快建立专门支持石油储备和石油投资的储备银行。根据测算，2010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约为2.9-3亿吨；

2020年估计为3.8-4亿吨。如今，石油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为22%左右。国际能源署（IEA）预测显示，2001-2030年中国石油领域的投资需要2.3万亿美元，因此，仅靠一般的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或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很难从根本上满足资金的需求，必须建立专门支持石油产业的投资和能源储备银行。政府可以协调外汇储备机构、石油企业、银行、投资基金等，设计一系列约束与激励制度，鼓励和支持石油企业或金融机构出资建立石油战略储备银行，并允许它们在石油战略储备基础上发行证券，这些证券可以作为资本金，也可以作为抵押贷款的标的物，甚至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这一机制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即不经国家批准不得动用石油战略储备的现货，政府有权在特定条件下回购或征用石油战略储备现货。

最后，建立一个有别于布伦特原

油和美国WTI原油定价体系的相对独立的石油定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壮大在石油市场的定价能力，可以在借鉴国际石油贸易市场的多层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国内实货交易市场，有步骤地推进纸货市场的建设，形成现货、远期、期货为重点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未来可以将外汇储备与能源储备结合起来考虑，把单纯的货币储备与更灵活的石油金融产品结合起来，即把石油金融合约如石油期货合约、石油债券合约等也视作一种新型的储备货币，既能使过多的外储向实物资源转化，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原油的定价。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焦点评论



多国空袭利比亚，资本市场受惊吓。石油供给有忧虑，经济复苏遇尴尬。日本天灾刚平息，非洲人祸在扩大。祈愿世界少磨难，化剑为犁治伤疤。

赵乃育 / 画
孙勇 / 诗

■ 拍岸涛声 | Wu Zhigang's Column |

地震给中日经贸带来新变化

吴智钢



自日本3.11大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海啸、核泄漏以来，人们纷纷关注此事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而日前也有一些文章见诸报端称：日本地震对中日经贸关系影响不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次地震对中日经贸的影响，开始逐渐露出了端倪，其程度超出了一部分人的预计。

上周五，一位在深圳华强北经营日产电子产品的朋友告诉我，日本的电子产品已经涨价一成左右；而他自己也被日本供货商告知，由于电力不足和交通不畅等原因，短期内难以按合同及时供货。据中新社报道，日本地震不足一周，珠江

三角洲对日贸易已经受到影响。目前，市面上的日系电子产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应该重视此次日本大地震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破坏以及其中对日经贸带来的变数。这个变数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海关统计显示，2010年，我国与日本双边贸易总值为2977.7亿美元，增长30.2%。其中，我国对日本出口1210.6亿美元，增长23.7%；自日本进口1767.1亿美元，增长35%。对日本贸易逆差为556.5亿美元。中日双方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中国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因此，充分估计到地震对中日经贸的影响，将有利于我们做好准备，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困难；也有利于我们及时抓住可能出现的机遇，利用好商机，壮大和发展我们相关的产业。

从日中经贸关系来看，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正在加强，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3.9%，日本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

■ 经济时评 | Hot Topic |

告别高能耗经济 降低核电风险

唐黎明

日本地震导致的核泄漏事件，引发了全球对核安全的普遍担忧，有的国家对核战略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德国称将暂停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计划3个月，并对所有17座核电站的安全性进行毫无保留的彻底检查，并且暂时关闭7座建于80年代的核电站。实际上，美国在此前也曾关闭多处核电站。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核电工业，被环保部誉为“绿色经济的希望”，还在大举跃进。据统计，中国现有6座核电站13台机组运行，此外还有12个在建的核电站，25个筹建中的核电站。根据“十二五”的核电规划，到2020年的核电装机规划将提高到8600万千瓦。未来10年，中国将要修建的核电站规模达到其他国家总和的三倍。不过，日本的核泄漏已引发中国反思核电建设，国务院近日称将调整核电规划，暂停审批新项目，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进步。

核电工业通常被冠以“绿色经济的希望”，肩负节能减排的重任，再加上各地对电力的需求旺盛，引发近年来中国核能规划大跃进。然而，能源需求再旺盛都不能成为漠视生命的理由，高耗能产业也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

邻国的核灾难，是教训也是警钟。如此庞大的核电发展计划，是否对核电安全问题有足够的考虑？以中国如此高的人口密度，是否在出现事故时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和应对空间？如此快速而迅猛地发展核电，在人才、资金、技术方面，是否有足够的保障？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希望得到有说服力的答案。

从选址上看，运行和规划中的核电站多建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这源于中国的电力负荷中心位于东南沿海，且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意外的是，近年来四川、重庆、河南、江西等人口稠密的内陆地区也将规划建站，让人匪夷所思。中国是一个人口大

国，这些临近大城市的核电站，万一发生核泄漏事故，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遭受辐射，这要求核电站的选址更为科学理性。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大规模扩张，原本规划于郊区的危险化工区域，因为城市的迅速扩张而被层层包围，近年来城市化工厂爆炸事件此起彼伏，危害邻近住宅区的安全，频频见诸报端。城市化的扩张，同样吞噬着原本受限的核电建设区域。1987年规划建设的大亚湾核电站，所在地龙岗區曾被称为深圳的“西伯利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扩张，也成为拥有近200万人口的大城区，核电站与人口稠密区的直线距离近在咫尺。而距离大亚湾一公里外，1997年规划建设了深圳的第二座核电站岭澳核电站。

核能利用如同一把双刃剑，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核电安全更具挑战性。日本地震所引发的核电危机，对中国未来的核电战略调整，是教训也是警示。对核电的无尽需求源自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是远离高能耗的正确途径。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严重依赖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对电力、资源的需求步步推高，间接推高了近年来的核电大跃进。虽然当前不少地方提出转变政绩考核方式，然而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发展路径具有强大的惯性和依赖性。在一些地方领导心目中，确保经济增长数量是硬任务，利益驱动的地方政府加快了高能耗项目的上马，所谓的节能减排也成了口号和形式主义。走高耗能经济的路径，不仅会使地方经济难以为继，还会对环境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害和污染。而以修建核电站来缓解能源紧张，无异于饮鸩止渴！长远来看，中国应该逐渐以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代替核电。与其一味地建危险的核电站，不如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因为再多的资源，都难填粗放经济的欲壑！

（作者系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ppl18@126.com。

该着急的不应该是 奢侈品价格高于国外

余丰惠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部分奢侈品国内价格高于海外价格的问题将解决。

陈德铭所说的奢侈品主要是欧洲、日本的一些名牌奢侈品。其国内价格过高，原因可归结于中国关税高、高档消费品分销体制层次多、费用大以及物流成本过高等。笔者对此有两点思考：一个是欧洲、日本一些奢侈品已经在中国加工制造，但是在中国大陆的销售价格却远远高于国外。拿上述理由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另一个问题更加令人思考，在中国国内价格高于国外的商品何止奢侈品，目前中国大陆大部分商品已经贵过美国，汽油价格高于美国，商品房价格甚至要高一到两倍，汽车等耐用商品也比美国贵，更加可怕的是，蔬菜、水果等日用消费品价格也在直赶美国，一部分已经贵于美国。

需要解决的何止奢侈品价格国内贵于国外？比奢侈品价格更急迫需要解决的是日常消费品以及汽车、住房等耐用商品价格高于国外的现象。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痛苦转型。出口受制于人民币升值和国际贸易壁垒垒影响已经在下滑，出口企业普遍面临不景气的状况；投资受到产能过剩、通胀以及经济过热的影响也已经难以为继；技术创新和启动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产业来分析，过去拉动经济引擎的房地产和汽车，一个受到调控影响拉动力直线下滑，一个受到限购正在大幅下滑。买车买房双双受限，对经济影响正在显现。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哪里？新增长拉动点是什么？正处于一个迷茫状态，需要认真思考 and 对待。

扩大国内需求、启动居民消费是根本出路也是当务之急，但形势不容乐观。央行最新调查显示，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包括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及储蓄存款，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创下了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消费意愿下降，有社会保障不健全、收入增长慢的老问题、老原因，更有高物价、高房价的新因素，其中，高物价是主要原因。高物价不仅在影响百姓生活质量提高，而且正成为中国经济痛苦转型的拦路虎。因此，解决普通商品高物价问题比解决奢侈品价格国内贵于国外更加重要和迫切。笔者大胆预言，长期高物价特别是长期贵过美国的高物价可能毁掉中国经济，可能影响中国政治稳定，可能使得政府失去民心。试想，居民平均收入是美国十五分之一的中国，却承受着比美国还高的物价，这里面就包括一部分日常消费品，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如何敢大胆消费呢，又怎不制约整个消费启动呢？

中国的高物价中生产成本并不高，到终端零售市场的畸高价格主要是流通成本推高的。流通成本中政府主导的高过路费和各种高收费，国有垄断企业产品如高油价等是中国大陆高物价的主要推手。可喜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把控制物价、抑制通胀作为今年的首要工作任务。现在关键在于落实，在于执行力。更为关键的是，政府是否有勇气拿自己主导的高过路费、高收费以及国有垄断企业产品高价格开刀。